

11/10/

杭州文史资料

92

第十七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杭州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12月

杭 州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七辑)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杭州云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2万

1993年2月 第 一 版

1993年2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浙出书临(93)第007号

目 录

“一定要消灭吸血虫病”！ ——记毛主席两次在杭州·····	邹华义 (1)
范岁久和他的丹麦大龙食品公司 ·····	周世南 (7)
孙晓村同志生平 ·····	新华社 (22)
裘绍烈士事迹 ·····	裘振纲遗著 (28)
中国同盟会会员包宗经 ·····	毛飞明 (38)
吴山民先生二三事 ·····	江天蔚 (42)
胡海秋传略 ·····	徐寿松 金绛年 (45)
我的祖父钱文选先生 ·····	钱镇国 (52)
杭州名医徐究仁 ·····	钟水浩 (72)
杨哲臣依玛目生平 ·····	杨静口述 丁芝山 李奇申整理 (75)
棋手董文渊的青少年时期 ·····	徐清祥 (80)
我打入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始末 ·····	郑 炎 (86)
风雨天目歌与剧 ——回忆浙西民族剧团·····	冯安琪 (91)
解放前夕的杭州地方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	张世昌 (101)
“五·二〇”运动在杭州 ·····	金 明 (104)
杭州《工商报》1949年的“春节号外” ·····	章达庵 (109)

峥嵘岁月	潘光友口述 管云长整理	(112)
自制手榴弹	杨一平	(115)
单身闯匪穴 招抚众枭渠		
——记朱超平动员匪首投诚始末	方浩然	(117)
“福寿堂事件”始末	何扬鸣	(122)
临安“七·五”洪灾纪实	杨一平	(127)
求是书院和求是精神	孙宗让	(132)
回忆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	金 明	(135)
余杭县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徐 煌	(140)
杭州穆兴中小学概况	丁永锡	(150)
先父杨镇毅与杭州赤城公学	杨叔威 杨福祥	(161)
新华社浙江分社成立始末	葛 明	(166)
喜雨台和杭州棋文化	徐清祥	(169)
读者·作者·编者		(172)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第六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173)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记毛主席两次在杭州

邹华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风景，令人神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两次在杭州的伟大活动，为中国血防事业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辉煌成就，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树立了历史的丰碑，使杭州更加秀丽，端庄。

受此恩泽，江西余江县人民于1958年消灭了血吸虫，升起了全国第一面血防红旗。其间的历程，其间的奋斗，均与毛主席两次在杭州的活动息息相关。

思恩寻源。1992年4月10日，我从北京来到杭州，下榻于杭州市卫生局招待所。在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庄炳瑾接见之后，由省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安排采访日程。

毛主席在杭州饭店发出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1日下午，气候宜人。由省地病办副主任李玉林陪同，驱车前往杭州饭店。沿湖公路，平如镜，形如月；两旁名贵的风景树，绿如茵，状如伞。我无心欣赏，独自回忆着在北京时卫生部长钱信忠、中央血防办主任鲁光接见我时介绍的

历史镜头——

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饭店主持华东、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潜心研究农业问题。11月16日，毛主席通过中央办公厅通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要他立即去汇报血吸虫病问题。翌日早晨，徐运北赶赴西郊机场，乘坐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文件的专机，当日上午到达杭州。中午，毛主席便接见了徐运北。毛主席一面听徐运北汇报，一面和当时的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等人商谈着。毛主席说，广大农民翻了身，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必须帮助农民战胜危害严重的疾病。当徐运北报到危害人民的几种疾病，最严重的是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多，流行地区广等情况时，毛主席说，有这么多病人，流行的地区那么大，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思想出发，毛主席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施同志负责。

当天下午，毛主席和省委书记们继续开会。晚饭时，又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流行血吸虫病的省、地、县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

当时参加会议的各负责同志对毛主席的指示都表示赞成。

会后，省委书记们亲自抓，采取有力的措施，出现了

“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大好形势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动人景象。

经过数年奋斗，我国广东、上海、福建、广西4省市区已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全国373个流行县中，有141个达到消灭标准，122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往日的凄凉景象，已被兴旺发达、人寿年丰的新气象所代替……。

“嘎——”，刹车声打断了我难忘的回忆，杭州饭店到了。

杭州饭店，位于西泠桥畔，临湖依山，环境幽雅。现由香格里拉国际饭店管理集团经营管理。因为是毛泽东主席曾经召开过重要会议的地方，休息厅、会场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一位年近三十、俊秀的女服务员，热情地引领我们瞻仰当年的会场和休息厅。

会场是大型会议室和剧场兼用，由主席台(舞台)和会议室(观众厅)两部份相接而成。会议室内，中间一条通道，铺垫红地毯，左右各有十二排单人楠木方桌和单人楠木皮垫背椅。壁灯与吊灯装配有致。主席台面则铺着绿地毯，后面垂下的宽幅的墨绿色金丝绒帷幕，映衬正前面月型楠木讲台。休息厅呈长方形，位于会场右侧。当年毛主席是由后台的过道进休息厅的。厅内，高窗采光，挂着白色双层皱纱窗帘。中间地面，铺着纯羊毛地毯。一盏盏兰花型壁灯下，是一排单人棕色沙发，两边扶手均铺着杭州名绣萧山花边。两张餐桌早已被收藏了，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听取徐运北汇报的。

整个会场、休息厅，朴素、穆静。

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写出 《送瘟神二首》

送瘟神二首

毛泽东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
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霹雳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向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诗篇，曾震撼过亿万人民的心。

杭州数日，我访问了原浙江省血防办副主任俞全甫、杭州市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朱景定、杭州市地病办主任朱永嘉三位血防老将。言谈中，他们敞开了山一般的胸怀，海一般的情感，表达了对毛主席深沉的思念，倾吐了读《送瘟神二首》的亲身感受。无疑，我身为余江人民中的一员，深受感动，倍受教育。

毛主席究竟在哪里写的《送瘟神二首》？我曾问过一位北京赴余江采访的作家，他回答：“在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室。”并且把这写入他的书稿之中。我曾请教鲁光主任，他肯定地说：“在杭州刘庄。”来到杭州，李玉林副主任告诉我：“听说在杭州汪庄。”而且陪我寻找了半日。

是在北京、还是在杭州？是在汪庄，还是在刘庄？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岂能众说纷云，张冠李戴？“有一个人知道，已退休在家。”李玉林见我焦急，脱口说出了新线索。

她便是老血防战士俞滨同志。省血地办周翼芳同志放下手头工作，陪我登门拜访。俞滨同志高龄七十，谈锋热情而稳健，她说：“七十年代末，中央血防办委托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送瘟神》，组织摄制组来到杭州。因毛主席写诗的地方当时对外保密，省卫生厅委托我办理有关手续。我跑外面，陪同摄制组的，是省血防办主任薛浩同志，他进去看过。”

于是我又求助于省卫生厅。省卫生厅老干部处的张国英同志挂电话联系，并派车送我至薛浩同志寓所。

薛浩，身材魁梧，双峰寿眉突起，虽然年满七旬，头发

染霜仍不失当年渡江南下、辗转千里的军人风采。他说：“毛主席写诗的地方是在杭州，在杭州刘庄；决不是其他地方。当时摄制组来了五个人，由我和省公安厅一位同志陪同，前后在毛主席写诗的地方工作了三天。先现场观察，写出分镜头，再选择场景和天气进行开拍。”

听了薛老的开场白，我非常高兴，激动地打开小型采访机，录下他那夹带山东乡音的普通话。他说：“刘庄是西湖苏堤两旁历史上庄园别墅中最大、最富丽的一处，原名‘水竹居’，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这里绿波竹影，回廊曲折，临湖依山，幽雅清新。现在已改建成为国宾馆。当时，我们一行从西门进入会客厅，再走进客厅南门，便是毛主席的书房。书房连着毛主席的卧室。我们拍摄的，一个是会客厅，一个是毛主席书房。书房宽大，大约80平方米。里面有五个大书橱，临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左侧放着一本台式日历，日历正好是：1958年6月3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面红旗》摊开放在台历之前。台灯与笔筒中间的桌面上，平放着毛主席常用的中国传统九行红格信笺，信笺上是毛主席《送瘟神二首》手迹。毛主席书房窗外，左边一株三米高的桂花树，右边一株枝叶繁茂的倒垂杨柳。这些，我记得清清楚楚，终生难忘。”

这时，薛老古铜色的脸上，滚动着泪珠，站起身，笑着说道：“这是毛主席对余江人民、对杭州人民、对全国人民留下的最珍贵的纪念，我们世代都要铭刻于心！”

听着薛老的话，望着杭州秀丽的景色，我想了很多很多，想了很久很久。至今思绪仍萦绕在杭州——光辉的杭州城！

范岁久和他的 丹麦大龙食品公司

周世南

以生产中国美食春卷驰名世界的丹麦大龙食品公司，其创办人范岁久，祖籍浙江慈溪，本姓袁，名椿年，因祖母慈溪清白堂范家无子嗣，乃寄姓范。”“椿年”语出《庄子》，意谓长寿，遂改名为岁久。父亲袁钟瑞，字仲符，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任职律师，与工商界人士接触较多。他热心提倡民族工业，先后集资创办武林铁工厂、萃盛蚕种场、水华汽车公司等多种企业，终因受到列强经济侵略影响，技术又较落后，难以求得发展。因而袁老先生总想把儿子范岁久送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以期有朝一日能为祖国效力。

范岁久1912年生于杭州，自幼在杭州求学。他父亲对中国旧学和书法都有研究，特为他延请一秀才教读“四书”“五经”和古文诗词，苦练毛笔字。父亲督责很严，使他得以在国学上有比较扎实的基础。有些名篇章句，至今犹能熟诵。前几年他回国事毕返丹，在去机场的汽车上说起少年时游杭州月下老人祠，随口背了当时在祠中的一幅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背完后还余

兴未尽，又背起了一幅谐趣联：“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远避迷途，退返莲迳还逍遥。”

1929年范岁久随家迁居上海，进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沪江地处黄浦江畔，校园宽广，校舍整洁，设备周全，同窗融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他至今还热心和支持校友会活动，1985年曾邀请同级级友到丹麦欢聚，参观他创办的大龙厂生产情况，游览丹麦名胜。

1933年父亲让他去日本求学。1934年他父亲通过与丹麦大隆洋行有贸易关系的立德油厂，为范岁久获往丹麦勤工俭学的机会，立即写信到日本告诉范岁久。范得悉后，听说丹麦文与德文相近，乃自修德文。其实这两者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同年他离日返国，1935年3月他自上海首途，只身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丹麦。当时中国人对丹麦还比较陌生，只知那是一个以农业发达著称的北欧小国，华侨只寥寥二十多人。范岁久到丹后，进了民众学校和农民学校，花两年时间学好丹麦语文和熟悉农业情况，随后就进入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今已改称为丹麦农业大学），以极大毅力专攻有关农业的各项科目。当时他在丹家完全以勤工养学，学习是十分艰苦的。1940年大学毕业，得到农学士学位，原想学成归国，不料风云突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横行欧陆，进占丹麦，战火弥漫，交通阻塞，这时他归国已不可能，乃决定留在丹麦，边工作边继续进修，终于在1945年获得硕士学位（相当于美德英的博士学位Ph.D.）。1989年丹麦政府为了便于国际间科技学术交流，又颁给他博士学位。

1945年开始，他在丹麦农业大学担任遗传学助教，1949

年他受聘在一家叫“Mecidinalco”的药厂，担任微生物科主任，从事抗生素的研究和有关制药工业原材料的检验，还与杰柯勃逊博士（Dr. Jacobsen）一起做维生素12的探索工作。1955年东亚公司（The East Asiatic Co.）买下了该药厂的产权，成立在东亚公司隶属下的杜梅克斯（Dumex）药厂。新厂成立后对职工自有一番调整，范岁久在他写的一篇回忆中说到当时情况道：“新厂成立对我们这些留用的职员都不加重用，我已感到我们旧职员要想今后得到提升，是没有什么大希望的了，因而在1957年我开始考虑另外寻找新职业。1960年我终于提出辞职。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把握能尽快找到新工作，为此我仍在杜梅克斯厂做点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工作，厂方也愿聘我为顾问，支付半薪，不算完全脱离。这以后我就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来选择寻找我的新工作。”他和杜梅克斯厂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他的春卷事业在已经逐渐发展起来时，才正式宣告脱离。

在范岁久初到丹麦还不很久的时候，他看到丹麦农产品丰富，就有一种想法，他曾回忆说：“在我来到丹麦时，就很自然地想到把中国最美味的食品和丹麦最优秀的原料结合起来。”这种想法他始终萦绕脑际，待机而动。他在离开杜梅克斯厂以前那段时间里，一直在试制中国食品，例如后来在丹麦颇有名气的中国酱油，就是他初次试做的调味品。那是他在1954年开始在住处地下室内制做的，不久就用小瓶包装卖给一些菜馆。这种小瓶装的中国酱油至今还很受客户欢迎。另外他也试做中国米酒，有时还带到办公室给同事们品尝。喝过的人都认为口味醇美。范岁久在试制时喜欢亲自操作，在做中国酱油时甚至不让儿子帮忙。他长子范本德

(BentVan)回忆当时情况说，他看到父亲做酱油时的发酵过程，很感兴趣，可是父亲不让他插手帮助，直到后来才允许他进工作室管理室内温度，调节通风排气。

1960年范岁久的春卷事业开始起步。虽说用丹麦的优质原料制作中国美食在范岁久是早有此意，可是诱发他制作春卷却是起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这年七八月间，有一次他和几个丹麦友人在一家中餐馆聚餐。在那里他们尝到了中式春卷，大家都认为味美可口，不禁使他联想起制作中国美食的念头。恰巧一起聚餐的朋友中有一个叫尼尔逊(Nielsen)的，在著名的丹京“大世界”铁伏里花园(Tivoli Garden)内有两个小摊，专卖香肠和冰糖丝，他很有兴趣也能在他的小摊上售卖春卷，于是范岁久就决意和他合作，做起春卷来。范岁久制作春卷的作场就是他家中的地下室。他开始试做口味不同的春卷，把做好的春卷当天送给尼尔逊，让他在小摊上试销，很受园中游客的欢迎。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铁伏里花园每年的营业季节由于气候关系，只有四个多月，即从五月份到九月份中旬，所以1960年春卷销售时间并不长。在1961年5月，春卷在花园的小摊上市，销售情况非常好，晚间几乎供不应求，有时在晚间接到电话，要他赶快再送货到铁伏里花园，说总不能在花园打烊前无货供应。这时范的“地下工厂”就得加班赶做，准时把货送到。也就在这个旺盛的销售情况中，范岁久预见到这小小春卷的广阔前景。他感到自己过去的想象将可以付诸现实了。他开始忙于找寻新的生产场所，购置一切必需的设备。也是在这一年，仍处在地下室的大龙厂前身“范氏工厂”(Vans Producter)成立了，从此一番十分艰辛而又极为壮丽的春卷事业轰轰烈烈地展开

了。

在草创时期，范岁久可说扑出整个心力，日以继夜。他的长子、现任铁路工程师的范本德在他的回忆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父亲当时常常在家里做中国食品，其中以春卷最吸引人，它特别美味。有一个晚上父亲在厨房里忙于试用第一架手工碎肉机时，他只一人在聚精会神地单干，也不让人相帮，不料一不当心，一个指尖被切去了。他不禁失声嚷起来，他的喊叫声从厨房里传出来，我们听到大吃一惊，急忙奔下楼去，只见他指尖流血很多，大家准备送他去医院，可是父亲的意思却不想去医院看伤，而是要把试验继续做下去。”这段话足以说明范岁久当时对事业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的女儿范丽孙(Lissen Stokhodm)，现任职医师，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记得父亲开始做春卷时，做了许多试味馅心，有用蘑菇的，有用竹笋的，有用嫩鸡的，有用牛肉的，再加各种调料如咖喱等，品种繁多，却都非常美味。当时我们这群孩子对于春卷口味的变化多样，都感到很大的兴趣，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我父亲为什么对制作春卷总是那么孜孜兀兀？也没有人想像过他在地下室忙忙碌碌活动背后的远景，当然更没有人能看到他的活动究竟会有怎样的发展……我父亲事业能壮大成长，主要是由于他的远见、勇气、毅力和一种务实的精神。当然，也是由于他有一批可以信赖的、坚强而极有能力的骨干队伍。”

1963年的夏天，由“范氏工厂”生产的春卷仍旧通过尼尔斯在铁伏里花园的小摊上销售，可是过去十分畅销的情况却趋于低落，这个奇怪的现象不能不追究原因。一查才知道

尼尔逊和他的女儿们在销售一个时期春卷后，也学到了一点制作春卷的方法，他们就自己干起来了。范岁久这时完全明白，如果把春卷销售的事交给一个不能合作的人，那对事业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他深信对春卷的生产他有充分把握，但销售却还缺乏办法，这时恰巧听说友人张作和对于经营饭店感到厌倦，很想另找工作，他就邀请张作和合作，由他主持生产，由张负责销售。此后两人合作得非常协调，因而产量回升，销售日增，生产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可是问题又来了：做好的春卷难以久藏，只有两三天保存寿命，对于销售非常不利。为了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货品保鲜期难题，范岁久又一次集中精力冥思苦想，反复实验，研究春卷的冷冻技术，试做冷冻春卷。同年，终于试制成功速冻春卷，春卷保鲜期延长，这在春卷生产上是一个飞跃，大大促进了销售量。生产场地因而又感到不敷应用了，1964年就**Egevangen**搬到哥本哈根市内**Vesterbro**，“范氏工厂”名称也改为“大龙”（**Daloon**）。龙是中国吉祥物的象征，

“大龙”意味着伟大的龙，也是对祖国的眷念和赞美。从这年起，大龙厂的厂址由于产量的不断激增，屡屡迁移，设备也不断更新，到1969年春卷的日产量已增加到万条。考虑到产量如再增加，在哥本哈根已找不到合适的厂房，而客观需求又正在方兴未艾，生产量势必要再加扩大，于是决定在离哥本哈根130公里的牛堡市（**Nyborg**）买地2.4英亩，兴建新工厂，安装新机器。1970年6月4日牛堡新厂正式建成启用，建筑费用共花了520万克朗（约70万美元）。1970—1980的十年是巩固和发展牛堡新厂的过程，厂的设备日臻完善，厂的制度日臻健全，1970年前厂未迁移前设备简单的小模规